

《东文选》文体编选与中国文献渊源*

褚大庆** · 金贤珠***

〈目次〉

- | | |
|---------------------|------------------------|
| I. 序 | III. 《东文选》与其它中国文献典籍的关联 |
| II. 《东文选》与中国诗文总集的渊源 | 1. 与《文心雕龙》的关联 |
| 1. 《东文选》与《昭明文选》的渊源 | 2. 与《史记》的关联 |
| 2. 《东文选》与《唐文粹》的渊源 | 3. 与《后汉书》的关联 |
| 3. 《东文选》与《宋文鉴》的渊源 | 4. 与《文章体式》的关联 |
| 4. 《东文选》与《元文类》的渊源 | IV. 结语 |
| 5. 《东文选》与《唐音》的渊源 | |

I. 序

本论文拟就《东文选》文体编选的客观外部因素，即与中国文献的渊源关系，进行简要的叙述和考察，以就教于方家。《东文选》，是以徐居正为主导的承文院23名官僚奉王命撰集，自新罗至成宗初期文人作品，于朝鲜成宗九年(1478)完成的一部诗文总集，共130卷。以为“艺苑之楷式”¹⁾。不难看出从书名到编纂目的，都源自中国的《昭明文选》。但遗憾的是，中、韩学

* 本论文为依据延边大学的基金项目(延边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与2020年度韩国外国语大学研究支援而撰述。

** 延边大学 中文系 副教授

*** 韩国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 教授

1) 《文献备考》卷243, 李佑成《〈东文选〉解题》, 徐居正等《东文选》, 汉城: 庆熙出版社影印, 1966, 第2页。

者并未深入探讨和分析这一重要课题。故本文拟就《东文选》文体编选的客观外部因素，即与中国古代诗文总集及其他文献的渊源关系，进行简要述考，以就教于方家。

II. 《东文选》与中国诗文总集的渊源

1. 《东文选》与《昭明文选》的渊源

(1) 中、韩古代相关文献记载

《三国史记·强首传》云：

强首及壮，自知读书、通晓义理。父欲观其志，问曰：“尔学佛乎？学儒乎？”对曰：“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儒者之道。父曰：“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所闻虽浅近，所得愈高远，魁然为一时杰。²⁾

七世纪末与薛聪等一起创造以汉字偏旁读写朝鲜语的吏读法的强首，曾就师读《文选》，且所得高远。

《三国史记》卷三十八《杂志》第七《职官上》“奈麻为之史四人”条云：

“国学，属礼部，神文王二年置。景德王改为大学监”至惠恭王元年：

授之法以《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分而为之业。博士若助教一人，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授之。诸生读书以三品出身：

2) 《三国史记》卷46 《列传》第6 《强首传》，[高丽]金富轼著，李康来校勘，《原本〈三国史记〉》，首尔：한길사，1998，第465页。

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能兼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³⁾

这段记载表明，《昭明文选》即文中所谓的《文选》，在新罗惠恭王元年(765，唐永泰元年)国学(后改称太学监)由奈麻为之史主管下指定博士或助教一人讲授，并以上、中、下三品加以判别，并且强调只有在读“《文选》而能通其义”前提下，“兼明《论语》、《孝经》者”才能定位上品。但不知这一制度一度被中断亦或记载有误，《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元圣王四年(790，唐贞元六年)开始设立读书三品科制：

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⁴⁾

这段文字与前面一段有关读书三品制的记载如出一辙。

韩国学者李九义先生在论及新罗汉文学时指出：

三国时代和新罗中期的“诗经体”、“楚辞体”和“五言诗体”诗风，即与此时文人们主要阅读《诗经》和《文选》等中国文学性书籍有关，这又源于新罗中期神文王时代设立的国学这一机构。随后的元圣王时代所设立的读书三品科考试科目中《文选》也有一定的比重。⁵⁾

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历史背景或曰文化环境的因素，只能算是远因，那么直接的例子有没有呢？金周汉先生在他的《崔孤云文学观的渊源》

3) 《三国史记》卷38 《杂志》第7 《职官上》，[高丽]金富轼著，李康来校勘《原本〈三国史记〉》，首尔：한길사，1998，第408页。

4) 《三国史记》卷10 《新罗本纪》第10 《元圣王》，[高丽]金富轼著，李康来校勘，《原本〈三国史记〉》，首尔：한길사，1998，第124页。

5) 李九义，《新罗汉文学研究》，首尔：亚细亚文化社，2002，第122页。

一文中指出，“崔致远的文学受到《文选》，特别是西晋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影响。”⁶⁾

又，《旧唐书》《东夷·高丽传》云：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⁷⁾

又，崔滋《补闲集》引文安公俞升旦言：

文安公常言：凡为国朝制作引用古事，于文则六经、三史，诗则《文选》、李、杜、韩、柳，此外诸家文集不宜据引为用。⁸⁾

《东文选》言及《昭明文选》的文章有：

其一，李奎报《琴秘监谢除翰林侍读学士表》文中一段注云：“《选》云：‘末学肤受。’”⁹⁾

其二，李穡《栗亭先生逸稿》序：“栗亭先生以雄伟之器，通《春秋》攻《萧选》，文章于是焉出。”¹⁰⁾

其三，李穡《选粹集》：“又集古今诗文若干卷，先生又名之曰《选粹集》。选取《昭明》，粹取姚姪，其义则选其粹也。”¹¹⁾

6) 同上，122页。

7) 《旧唐书》卷199上，列传149《东夷·高丽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第5320页。

8) [高丽]崔滋《补闲集》，转引自蔡美花《高丽文学审美意识研究》之附录《高丽时期文论》，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第203页。

9) 李奎报《琴秘监谢除翰林侍读学士表》，《东文选》卷36-34。按：“末学肤受”出自张衡《东京赋》，《文选》卷三，[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51页。

10) 李穡，《栗亭先生逸稿》序，《东文选》卷87-6。

其四, 郑道传《〈若斋遗稿〉序》:“诗道之难言久矣, 自雅颂废, 骚人之怨诽兴, 昭明之选行, 而其弊失于纤弱。至唐声律作, 诗体遂大变。”¹²⁾

其五, 李詹《楮生传》则比较详细言道:“仕梁臣太子统, 同撰古《文选》以传于世。”¹³⁾

中国著名学者张伯伟先生指出:

从三国时代到统一新罗时代, 经过高丽直至朝鲜朝, 《文选》可以说一直是汉文学的基本读物。《旧唐书·高丽传》说子弟未婚之前, 在扃堂昼夜读书, 对于《文选》“尤重爱之”。统一新罗时代, 《文选》被立为国学教材, 与《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并列。又制定读书三品出身之法, 能通《文选》者可列为上品, 而中、下品就没有对《文选》的要求。¹⁴⁾高丽时期, 《文选》是涉及国家大制作的典范之一。到朝鲜朝, 虽然启蒙读物中增添了《古文真宝》、《文章轨范》、《联珠诗格》等书, 但《文选》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动摇的。

(2) 二者的文体分目特征与异同

1) 《昭明文选》文体分目

《昭明文选》选录了先秦至南朝梁代的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难、移三十九种文体。

2) 《东文选》文体分目

《东文选》文体分目为辞、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七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敕、教书、制诰、册、批答、表笺、启、状、露布、檄书、箴、铭、颂、赞、奏议、札子、

11) 李穡, 《选粹集》序, 《东文选》卷87-20。

12) 郑道传, 《若斋遗稿》序, 《东文选》卷89-11。

13) 李詹, 《楮生传》, 《东文选》卷101-8。

14) 原注参见《三国史记》卷三十八, 《杂志》第七, 明文堂, 1988页。

文、书、记、序、说、论、传、跋、致语、辨、对、志、原、牒、议、杂著、策题、上梁文、祭文、祝文、疏、道场文、斋词、青词、哀词、诔、行状、碑铭、墓志五十五种。

3) 《东文选》与《昭明文选》文体异同

① 二者相同的文体

仅就名称而言相同的文体有辞、赋、诗、册、启、书、箴、铭、颂、赞、序、论、诔、祭文、行状、墓志十六种；基本相同的文体有诏敕(《昭明文选》为“诏”)、教书(《昭明文选》为“教”)、檄书(《昭明文选》为“檄”)表、笈(《东文选》为“表笈”)对(《昭明文选》为“对问”)奏议(《昭明文选》为“奏记”)六种。即便这两种情况算在一起为二十二种，二者文体相似度也不到50%。

② 二者各自专列文体

《东文选》专列文体有：制诰、批答、状、露布、札子、文、记、说、传、跋、致语、辨、志、原、牒、议、杂著、策题、上梁文、祝文、疏、道场文、斋词、青词、哀词、碑铭二十六种。

《昭明文选》专列文体有：骚、七、令、策文、表、上书、弹事、设论、符命、史论、史述赞、连珠、哀、碑文、吊文、难、移十七种。

不可忽视的是，韩国学者李锺建与李福揆在其合著《韩国汉文学概论》第一章《总论》中指出在汉文文学中，6世纪中国梁代昭明太子编纂刊行的《昭明文选》所载39个“장르”为其渊藪。¹⁵⁾

总之，不难看出，《东文选》无论是在诗文总集的命名上，还是在文体分类的编纂原则，乃至代表性文体的选取上，与《昭明文选》都有着根本性的渊源关系。

15) 按：“장르”是指代“文体”的。李锺建、李福揆，《韩国汉文学概论》，京畿道坡州：宝晋斋，1991，11-20页。

2. 《东文选》与《唐文粹》的渊源

(1) 《唐文粹》概述

《唐文粹》，一百卷，原题为《文粹》或《唐贤文粹》，宋姚(967~1020)编辑。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断代诗文选集，成书于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唐文粹》古赋、诗、古调歌篇、颂、赞、表奏书疏、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记、箴戒铭、书、序、传录记事等十八类二十五种文体。

(2) 《东文选》与《唐文粹》的异同

1) 二者的相同点

其一，《东文选》和《唐文粹》均收录了赋、颂、赞、文、论、议、铭、记、箴、书、序、传十二种文体；其二，文体排序上，赋均列为诗前。其三，均以儒家文学观为文体的中心思想。

2) 二者的差异

首先，在文体的择取上，《唐文粹》有着鲜明的崇古倾向。“是编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¹⁶⁾诗歌以古体诗为主，不收近体诗及四六文。

其次，在文体的种类上，《东文选》比《唐文粹》多三十八种，诗体部分则古、近体全录。文章也并兼选古体与四六骈文。

也就是说，《东文选》所选取的文体重在其“一代之文”的典范性，而非厚古薄今。

3. 《东文选》与《宋文鉴》的渊源

(1) 《宋文鉴》概述

《宋文鉴》，北宋诗文总集，原名《皇朝文鉴》，共一百五十卷，南宋

16) 同上，2页。

吕祖谦(1137~1181)奉孝宗之命编辑。这六十一门即六十一种文体：诗、四言、乐府歌行(杂言附)、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七言绝句、杂体、骚(如骚者亦附)、诏、敕、赦文、册、御札、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三篇、书判、题跋、乐语、哀辞、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神道碑、传、露布

(2) 《东文选》与《宋文鉴》的异同

1) 二者的相同点

其一，二者均以“赋-诗-文”的文体顺序结构全书，诗歌部分均以“古-律-绝”的顺序排列；

其二，二者在诗体上均收录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附六言)、七绝七种诗体，此外还有三种杂体诗文体一致，即八音体、17)回文体18)和集句体；

其三，二者均收录了赋、册、批答、箴、铭、颂、赞、记、序、论、议、说、书、启、杂著、上梁文、哀词(辞)、祭文、行状、墓志、传、露布等二十二种文体；

2) 二者的差异

首先，《宋文鉴》有三十一种文体与《东文选》不同，即律赋、四言、乐府歌行、杂体、骚、表、笺、诏、敕、赦文、御札、制、诰、奏疏、碑文、义、戒、策、制策、说书、经义、策问、对问、移文、连珠、琴操、书判、谥议、墓表、神道碑铭、神道碑；

17) 《东文选》卷5-56, 洪逸童, 《效八音体寄刚中》。

18) 《东文选》卷9-12, 李知深, 《感秋回文》；卷9-23, 李仁老, 《献时宰回文》；卷10-110, 朴堧《双韵莲花回文体幽居作并序》两首, 朴堧《诗序》：“古人回文诗有十字体、璇玑体、玉连环体、锦缠枝体，各有别样体例。今予不袭古辙，别作五言四韵诗二篇，作莲花之状，寄意于君子，名之‘莲花回文’云。”《东文选》(上), 庆熙出版社, 1966, 127页。

其次,《东文选》专有文体为辞、诏敕、教书、制诰、状、檄书、奏议、札子、文、辨、对、志、原、牒、策题、祝文、疏、道场文、斋词、青词、诰、碑铭等二十二种文体。还有,《东文选》的三首六言,既有绝句,又有律诗,而《宋文鉴》的六言均为绝句;

第三,《东文选》对于其中一些文体的编选原则,相对于《宋文鉴》所选文体强调儒家思想的单一性而言,显得比较丰富些,儒、释、道各家思想观念都涵盖了。

就文体而言,《东文选》与《宋文鉴》有这较为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在诗体的种类上,二者基本一致,其次,在诗体的编次上,均按“古-律-绝”的先后次序排列。这些都很难说这是一种巧合。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上梁文这一文体也是首次被收录在《宋文鉴》中。

4. 《东文选》与《元文类》的渊源

(1) 《元文类》概述

《元文类》,元代诗文选集,原题为《国朝文类》,七十卷,目录三卷。元苏天爵(1294~1352)编辑,成书于元统二年(1334)。凡分四十有三类:赋、骚、乐章、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诏敕、册文、制、奏议、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书、说、题跋、杂著、策问、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谥议、行状、墓志、墓志铭、墓碣、墓表、神道碑、传。

(2) 《东文选》与《元文类》的异同

1) 二者的相同点

首先,二者的文体编选原则均为有补于世俗和政治教化。

其次,二者均收录了赋、诏敕、奏议、箴、铭、颂、赞、记、序、书、说、杂著、启、上梁文、祝文、祭文、哀辞、行状、墓志、传,及五古、七

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二十一类二十六种文体。

第三，在分目上有多达二十六种文体一致，也就是说二者有半数以上的文体相同。

2) 二者的差异

其一，《元文类》的诗体划分较细，共分为乐章、四言、五古、乐府歌行、七古、杂言、杂体、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十一类。而《东文选》则为九类，专列诗体为五、七言排律和六言诗。此外，《元文类》只有骚、谥议两种文体为其专有；

其二，《东文选》不仅在文体种类、文章数量上都超过了《元文类》，还包括儒、释、道各家代表性文体样式，比如十九篇表达佛教思想的碑铭，三十六篇记述道教科仪的青词。而《元文类》则没有收录表现佛教和道教思想文化内容的文体。

通过直观对照，我们发现，在文体上《东文选》几乎涵盖了《元文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文体创作种类的相对贫弱。

5. 《东文选》与《唐音》的渊源

(1) 《唐音》概述

唐诗总集，作者是元代杨士弘，字伯谦。《唐音》的编造，始自元统三年(1335)，成于至正四年(1344)，全书15卷，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共收唐诗1341首。《凡例》说“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所以不收李、杜、韩三家诗。

(2) 《东文选》与《唐音》异同

1) 二者的相同点

二者总体上均以“古-律-绝”顺序依次排列，即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的次序编排。

2) 二者的差异

其一，六言绝句的位序不同。《唐音》将其附于五言绝句后，而《东文选》则列于七言绝句后，且选录一首六言绝句和两首六言律诗；

其二，诗体的卷次编排不同。《唐音》中的五古、七古、五律、五绝各含上、下两卷，卷上选初唐诗，卷下选盛唐诗。七律与七绝则各含上、中、下三卷，分别选录初盛唐、中唐和晚唐诗。而《东文选》均依次编卷，五言古诗编于卷四至卷五，七言古诗编于卷六至卷八，五言律诗编于卷九至卷十，卷十一为五言排律，卷十二至卷十七为七言律诗，卷十八为七言排律，卷十九为五言绝句，卷十九至卷二十二为七言绝句，六言附于卷二十二七言绝句后。

可以看出，《东文选》与《唐音》在诗体的总体编排次序上是一致的，但有细微的差别。

III. 《东文选》与其它中国文献典籍的关联

1. 与《文心雕龙》的关联

南朝梁刘勰撰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大而虑周”¹⁹⁾的文学理论专著。它收录了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四大类文体，以及四十四种次文体，共七十八种文体。

对比一下，《东文选》与《文心雕龙》除了诗、赋、颂、赞、铭、箴、论、说、表、启、议、对、书、记等十五种文体完全相同外，还有祝文(祝)、碑铭(碑)、檄书(檄)、奏议(奏)等四种文体名称稍异者，即《东文选》有近二

19)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559页。

十种文体与《文心雕龙》相同。而诸如致语、青词等《东文选》选定文体，大多为唐、宋以后出现的。

2. 与《史记》的关联

《旧唐书》之《东夷·高丽传》云：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²⁰⁾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史记》在内的“前四史”业已成为高丽儒士们习读的重要书籍。又，《东文选》卷93-4尹淮《进讎校高丽史序》云：

臣窃惟司马子长，负迈世之气，平石室之文，作《史记》百三十篇，抑扬去取，自成一家。²¹⁾

尹淮这段话无意中道出《史记》与《东文选》的渊源主要两点：一是体例结构上的“百三十篇”，而《东文选》恰好为一百三十卷；一是“抑扬去取，自成一家”的自信与骄傲。这一思想深刻地表现在徐居正的《〈东文选〉序》中“是以代各有文，而文各有体。……我国家列圣相承，涵养百年。人物之生于其闲，磅礴精粹，作为文章，动荡发越者，亦无让于古，是则我东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汉唐之文，而乃我国之文也。宜与历代之文并行于天地间，胡可泯焉而无传焉！”

除了这种宏观上的影响之外，《史记》“七十列传”对《东文选》“传”文

20) 《旧唐书》卷199上，列传149《东夷·高丽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0页。

21) 尹淮，《进讎校高丽史序》，《东文选》卷93-4。

体也有深远的影响。

3. 与《后汉书》的关联

《后汉书》列传著录了六十二种文体，即：

诗、赋、碑、碑文、诔、颂、铭、赞、箴、答、应讯、问、吊、哀辞、祝文、祷文、祠、荐、注、章、表、章表、奏、奏事、上疏、章奏、笈、笈记、论、议、论议、教、条教、教令、令、策、对策、策文、书、记、书记、檄、谒文、辩疑、诫述、志、文、说、书记说、官录说、自序、连珠、酒令、六言、七言、琴歌、别字、歌诗、嘲、遗令、杂文²²⁾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学者古川末喜就曾指出：“在《后汉书》的‘记’、‘传’之后，常分文体著录本人的著作。如张升传载：‘著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并不是按张升的六十篇作品名一一列举，而是将其归类为赋、诔、颂、碑、书等五种文体。由此可见，后汉时代就自发地产生了文体分类观。宋范晔因直接或间接地根据后汉史料而编纂了《后汉书》，故可视该类文献分类为后汉产物。”²³⁾随后列出了他所统计的六十个类目的文体：

诗、赋、颂、铭、诔、书、奏、说、论、箴、吊、赞、教、令、议、策(文)、嘲、表、答、檄、笈、荐、问、注、诫、述、志、文、碑(文)、记、章、章奏、自序、连珠、酒令、书记、奏事、七言、六言、别字、歌诗、祠文、哀辞、条教、辨疑、琴歌、对策、遗令、祝文、应讯、祷文、杂文、哀文、谒文、上疏²⁴⁾

范晔(398~445)《后汉书》至少有十处专门提及一些文体，²⁵⁾除去重复

22) 同上。

23) [日]古川末喜著，杨丽华译，《六朝文学评论史的文体分类论》(原载于《中国诗人论——冈村繁教授退休纪念论集》，汲古书院，1986年)；刘柏青、张连弟、王鸿珠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古典文学专辑)第五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49页。

24) 同上，50页。

25) 即卷28下《冯衍列传第十八下》“(冯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

者，计有赋、诔、铭、说、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诗、颂、书、文、记、论、议、六言、七言、别字、歌诗、箴、吊、诸解诂、表、碑、赞、哀辞、奏、琴歌、对策、遗令、连珠、祝文、章表等三十三种。

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太注意《后汉书》中所提及的文体，然而它却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体学研究史籍。通过直观对照，我们可以看出，《东文选》的赋、铭、说、诗、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箴、表、赞、哀辞（词）、祝文等十六种文体与之相同。

4. 与《文章体式》的关联

《隋书》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云：

（杜）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弱冠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²⁶

诂》、《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卷40下《班彪列传第三十下》“（班）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东平宪王刘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卷44《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胡广整理编辑）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篇。”卷52《崔駰列传第四十二》“（崔駰）所著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崔駰次子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艺》、七言，凡五十七篇。”卷54《杨震列传第四十四》“（杨）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卷59《张衡列传第四十九》“（张衡）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诂》、《悬图》凡三十二篇。”卷60上《马融列传第五十上》“（马融）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卷60下《蔡邕列传第五十下》“（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尽管我们今天很难了解高丽、百济文士称为《杜家新书》，被“时人号为文轨”的《文章体式》具体面目，但是通过这段珍贵的史料记述，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东文选》所载文体具有格式上规范与韵律上严整之特点。

IV. 结语

纵观上文可知，《东文选》与《昭明文选》有着根本性的关联，就文体而言，二者相合者共有二十二种，且均不选经、子之文。《东文选》的文体种类可以说涵盖了《唐文粹》，文体排序上，赋均列为诗前，诗体部分则古、近体全录。文章也并兼选古体与四六骈文。也就是说，《东文选》所选取的文体重在其“一代之文”的典范性，而非厚古薄今。《东文选》与《宋文鉴》的关联更为直接。均以“赋-诗-文”的顺序结构全书，诗歌部分均以“古-律-绝”的顺序排列；在诗体上均收录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附六言)、七绝七种诗体，此外还有三种杂体诗文体一致，即八音体、回文体和集句体。此外，从二者的“题跋”和“上梁文”，“表、笺、制、诰”和“表笺”、“制诰”，“致语”与“乐语”等都可以看到其相互间的联系。《东文选》与《元文类》的文体编选原则均为有补于世俗和政治教化，而且在分目上有多达二十六种文体一致。《东文选》与《唐音》在诗体排列顺序有一些关联，二者总体上均以“古-律-绝”顺序依次排列，即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这样的次序编排。此外，《东文选》与《文心雕龙》、《史记》、《后汉书》、《文章体式》等中国文献典籍也有可供评点的共性之处。

总之，《东文选》与《昭明文选》《宋文鉴》《元文类》等中国古代诗文总集关联密切，选文以具有时代意义的实用或应用文体为主，例如上梁文；诗、赋则以典范性或代表性为主，例如选录了集句诗、杂体诗和六言诗等。当然，《东文选》与中国古代诗文总集或文献的关联是客观的外在因

26) 《隋书》卷76《列传》41, [唐]魏征等《隋书》，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1958年, 第780页。

素，其内在的主观因素，即其本土文化的发展与需要，将另文撰述。

<参考文献>

- [宋]姚铉编,《唐文粹》,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卷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卷4,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元]苏天爵编,《元文类》,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卷7,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蔡美花,《高丽文学审美意识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
- 陈彝秋,《论中国选本对朝鲜〈东文选〉文体分类与编排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2010.
- 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中国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全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 金富轼著,李康来校勘,《原本〈三国史记〉》,서울:한길사,1998.
- 李九义,《新罗汉文学研究》,서울:亚细亚文化社,2002.
- 徐居正等,《东文选》,서울:庆熙出版社影印,1966
- [日]古川末喜著,杨丽华译,《六朝文学评论史的文体分类论》(原载于《中国诗人论——冈村繁教授退休纪年论集》,汲古书院,1986),刘柏青、张连弟、王鸿珠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古典文学专辑)第五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 Abstract >

The “东文选” and Chinese poetry collections and historical books and records have more specific sources. There are twenty-two kinds of literary styles in “东文选” and “昭明文选”; there are twelve literary styles in “唐文粹” and both use the style of poetry before poetry; The sequence structure of poems and texts includes the same seven poems in the poetry. In addition,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poems in the same style. In the poetry section, as in 宋文鉴 and 唐音, The order of “古—律—绝” is the same; the principles for selecting and editing styles of “元文类” are supplemented with secularism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half of the same styles in sub-headings. In addition, there are certain links between the “东文选” and the “文心雕龙”, “史记”, “后汉书” and “文章体式”.

Key Words : 东文选(*Dongmunseon*), 文献(Literature books), 中国(China), 文体(Literary style), 渊源(Origin)

